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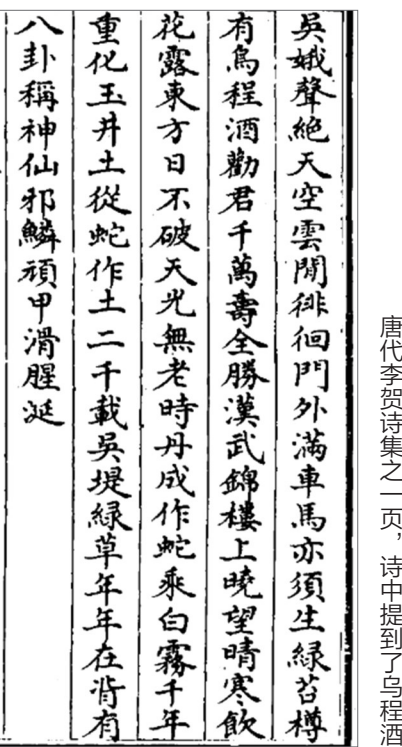
钩玄发微

从语言学角度看“乌程”一词的含义

吴永祥

在湖州的历史上，乌程县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有人会问，“乌程”二字是什么意思呢？当然，稍懂点湖州历史文化的人会说，“乌程”二字源自秦时乌巾、程林二氏（两家善于酿酒）。这种说法主要是来自湖州本地的传统方志和有关文献，如晋代的《三吴土地记》云：“县有乌林氏，秦时程林、乌巾二家，能酿美酒。始皇二十六年，改菰城县为乌程县，属会稽郡。”南宋嘉泰《吴兴志》载：“城面溪泽，菰草弥望，故名。秦既并楚，改曰乌程，属会稽郡，以乌巾、程林二氏所居也。古者因生赐姓，后之郡县乃多因姓而命名。二姓以善酿雄其乡，音又相协，秦尚富强，一时更革，至今仍其名也。”

而在晚清时，著名学者李慈铭已经发现浙江地区的许多地名是古越语的遗存了，他在自己的《越缦堂日记》中指出：“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



唐代李贺诗集之一页，诗中提到了乌程酒

无得而解。”具体到“乌程”，首先要讲讲这个“乌”字。其实在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看来，“乌程”其实是古越语的遗存。“乌”字没有实际意义，如高旭彬在其文章《乌伤：一个美丽的误会?》中提到：“当代著名史地学家与语言学者如谭其骥、陈桥驿、周振鹤、游汝杰等还曾进一步指出，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广泛遗存。根据他们的研究，今江浙一带的姑苏（苏州）、无锡、乌程（古代湖州属县）、由拳（古代嘉兴）、句章（今宁波慈城一带）、姑蔑（即太末，汤溪龙游一带）等地名都是越语孑遗。”贯于首的“姑、句（通勾）、乌、余、由、无”等字其实都是越语发声词，并无实际内涵。这是一种“齐头式”的格式。周振鹤、游汝杰先生在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还提及，“以乌（音）为发声的做法在当代的闽南语中仍不鲜见，同时，在浙北地区以乌字起头的地名还有很多。”

当代学者李锦芳则认为“乌为民族总称、程为专名”（这里的民族是指古百越族），他在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的论文《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中指出：“于、於、乌百越地区此类地名有：乌伤、乌程、於陵、于菟、于潜、于乡。此类通名亦作百越部族名冠首字：于越、乌浒。这种族称冠首字其实是百越自称瓠(他称瓠)的异写。东越亦为东瓠，西部有西瓠。据《逸周书》及《路史》，先秦百越各部有：涿深、越涿、瓠、瓠越、瓠、且瓠、瓠人、区吴等。可见瓠(涿)成为了百越各部的普遍族称。古区、涿、瓠通。说文：瓠，小盆也；涿，久渍也；区，藏匿也。可见百越族称瓠等字是记音用字，与本义无关，于乌亦无实义。于於乌冠首的百越地名源于部族、支系名，于於乌为民族总称，伤、程、潜、乡等为专名。《汉书·地理志》：‘乌程县，秦置，古为乌程氏居，因名。’此明言地因人而名。有人认为乌程是姓氏，我们觉得它更像百越部族名称，有如乌浒。乌程后作姓是源于部族名。这种由部族名变为地名的例子在百越地区并不少，夜郎、句町、且兰等均如此。广西南部古有乌浒滩，亦由乌浒



位于吴兴区八里店镇境内的清代乌巾桥

按学者李锦芳的研究，“乌程”应当是古越族的部族名称，后来才成为地名。而“乌程”一词其实是汉人的音译。而湖州地区也的确是先秦时古越族生活之地。因为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吴越虽为两国，但其民大概率为一个民族（古越族）。古书中记载：“三吴在古不入职方，其民皆断发文身。”

《吕氏春秋》中云：“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从考古成果看，湖州地区也有越国文化遗存，如安吉发现了越国贵族墓群。又根据文献记载，直至汉代，仍有越人生活，如《吴兴备志》引《舆地志》曰：“汉文帝封东海王摇之子为顾余侯，即乌程之西余山也”，又引《路史》曰：“楚灭越，封越王无疆之子蹄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子孙因以为氏。”东海王摇、无疆之子蹄都是越人。当然，文献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越人生活在西余山、欧余山周边。但是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西余山（现名西山）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马桥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这不是一个古越族先民们的生活遗址呢？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有所定论。

那么，古人给“乌程”二字赋予了“酒文化”这个含义，有没有依据呢？我觉得不能说全无依据。正如读者们会问，那“乌程”这个古越族部族中的人会不会酿酒呢？笔者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考古发现，我国酿酒的历史很悠久，浙江也不例外。在我省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器，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盂、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盂两种；而陶盂形似酒壶，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叭口，中间以扁平半耳环连结。器壁内外打磨光滑，制作精细，今天看仍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酒器。而在《国语》的《越语》中有如下记载：“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这个记载，主要是表明当时越国为了奖励人口优生优育而出台的一项政策，从侧面也反映了越国人是会酿酒的。

正是因为有了“乌程酒”这个文化构建，让许多古人特别是读书人知道了“乌程”，并成就了许多诗篇。唐末罗隐有“一瓶犹是乌程酒，须对霜风度汝然”句，北宋秦观有“薄茶便当乌程酒，短艇聊充下泽车”句，宋人祝从龙有“百年烂醉乌程酒，千首新吟晋宋诗”句，明末清初写出“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伟业有“扁舟百斛乌程酒，散发江湖任醉眠”句。而自从秦朝乌程县设立后，很长时间内乌程是湖州人的深刻记忆。后来的许多湖州属县都是从乌程县划出的，如长兴县，原名长城县，是在西晋时从乌程分出；又如永安县，就是后来的武康县，是在东汉时从乌程、余杭分出；又有归安县，也是北宋时从乌程分出。

如今，虽然乌程县的建置早已撤消了，但还有许多与被古人文化构建过的“乌程”有关的地名曾经出现过或留存了下来，如吴兴区有乌山、乌巾桥，德清有乌巾山（现叫德清山）。

说画论藏

人文收藏,构筑嘉会之桥

忍冬

自从近代报纸出现后，迅速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它的时效性、广播性与易藏性均高于书籍杂志，报纸的副刊也因它的时效性而深获读者青睐，许多文集或小说最先都刊载或连载于报纸副刊，再精选成集出版的。湖州张顺发先生的“人文收藏”就是从收集报纸资料起步。

收藏，通常缘起于没事偷着乐。张顺发早年在医院药剂室工作，时常接触到各种药盒，他发现许多废弃药盒上的商标图案丰富多彩，便剪贴成册以供参考与自赏。2010年他结识湖州收藏自行车标牌的卢守雄，写了相关报道刊于《湖州晚报》并感言：“一个人穷其一生，做一件钟爱的事，并不会因年老与岁月流逝而淡忘。”

从上世纪80年代受聘通讯员以来，张顺发与纸媒结下不解之缘。起初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纸，然后分门别类剪报成册。随着报纸的相继扩版，容量越来越丰富，文章也由“豆腐块”升级为“千张页”，剪报的方式已难以取舍，于是，他便将版面分门别类套入文件夹，贴上题名加以收藏，以人物专题为主线，旁及重大事件、热点新闻、行业史料，及其它综合性资料多达近千种，且做到只要说起湖州一些文化、文艺人才或提及某事，他都能快捷地取出相关的资料袋，里面除报纸版面外，还有相关的照片、文稿、名片、票证等一应俱全。

书籍在爱书人之间的传承与流转，才是作者最为欣慰的归宿。步入张顺发新居书房，窗外一抹翠色入帘青。旧日书桌一角置以药箱，上面供名医李时珍随形根雕，还请人补刻上铭记，所见“潘春林先生处方笺”，在1964.5.16开出的药方中“苦丁茶”“忍冬藤”都名列其间。张顺发有段时期办公室地正处于湖城府庙一隅，因近水楼台于书摊购藏过许多纸品资料，他通过这些藏品的转赠或分享，又结识了新知或知音。

2009年，张顺发拿着在书肆购藏的《西塞烟云》登门拜访湖城名宿凌以安先生，此书为凌老2000年送出的签赠本，凌老欣然再签下“顺发先生购于书摊，凌以安2009.10.26”的题记，他随后经过5次采访，不失时机地以《世纪风雨情》的文章，记述了凌老的风雨历程。

张顺发人缘甚好交友极广，可谓三教九流难以细数。浙江文坛的汪浙成、李杭育、高峰等作家的资料，是张顺发重点收集的对象。作家高峰常年专注笔耕，无暇关注相关的资料收集，当他看到张顺发所汇有关自己各时期文档专辑时，在感激、赞赏之余均悉数拍照留存。在与名士或凡人的交往中，张顺发都一视同仁，通常以资料开路便一见如故，不过这仅是第一层面，接着他会将会面过程结合所藏资料写出报道或散文发表，这第二层面不仅回报了受访者，也创作了属于自己的“人文档案”。

早年在菱湖医院工作时，张顺发与龚肇智、徐克昌是同事。二老均属治学勤勉且为人低调的前辈，作为后学的张顺发，既敬仰老同事著书立说的功德，且想借自身的人脉与特长，为师长们的学术成果推介助其一臂之力。他在本地报纸上发表了相关独家报道如《一代喉科名医徐荷章及其子女》《龚肇智和他的湖州明清望族研究》《在人文经纬线上》等推介文章，同时，也为龚老师这一冷僻的学术成果，日后受到嘉、湖两地有关部门的重视，起到了牵线搭桥的重要作用。

有幸多次拜访湖州版画家赵延年先生，应该是张顺发最为珍视的经历。2010年9月15日，相机定格了赵老轻抚家乡晚辈之手的情景，这动人的轻抚，既体现出赵延年的故乡深情，也无不透露出张顺发的亲和力，这便是他常年接地气而历练出来的社交“杀手锏”。当张顺发递上多年收集的相关资料时，赵老师浏览后十分感动，应允为其写“人文收藏”题词，并于每年寄赠自制的贺卡问候新年。

茶人寇丹，自号“文场寇寇”，素以桀骜不驯著称。不过老先生遇上热人心张顺发这位忘年交，便如同他画笔之下的“黑猫”遇了脾气。2017年春节，寇丹应约在《湖州晚报》开专栏，每周一篇的所有文字，均由张顺发负责请人打印，经作者校订后送去报社刊发，费用均由张顺发自理，以至2018年《寇丹随笔》结集出版事宜，也由他一手操办，故此，寇丹执意要以“友友之文”作“代序”。2019年邀为《十二邀·阅湖州》大众文化讲坛文稿成书，其中，由寇老主讲“一片茶叶”开坛，他在扉页上书赠张顺发：“感谢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当初寇老去韩国问茶，全程由张顺发陪伴与照顾，鲜为人知的深情都凝聚于“无微不至”这4字之间！

桐乡作为湖州毗邻之地，也属重要的人文旁观者。张顺发经徐重庆先生牵线结识桐乡乡人夏春锦，彼此相知相交与《梧桐影》民刊同步，守住了这份绵长的书香。诚如菱湖籍作家费爱能感言：“好好地写一部张顺发传记，恐怕是最具意义的一桩事了。”作为沪上著名的传记文学家，费氏能出此感慨当属肺腑之言。

随着网络博客等新传媒的相继停摆，许多民间一手资料遂成过眼烟云，而不玩电脑的张顺发，其纸质“人文收藏”却因坚守而“修成正果”。现在原件转成网版很容易，而没了原版真的就无迹可寻了。张顺发的贤内助朱炎琴，同为医务工作者，在整理资料与誊写稿件等诸多方面均功不可没。

“聚茗雪风流点滴，汇菰城隽水文脉。”张顺发的纸媒体面收藏，并不追求创刊、复刊、号外、年代之类可寄货可居的珍藏，而是锲而不舍地收藏与人生同步的纸媒体面，他借重的是“藏以致用”，属名副其实的“人文收藏”。资料共享是他的最大心愿！



赵延年题署



剪报资料

品读评赏

湖州晚明四大出版家族之编刊与扬播——读赵红娟教授《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



《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赵红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徐 洪

赵红娟教授《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一书，主要通过对湖州四大望族书籍编选、评点、序跋、刊刻及销售活动的系统研究，从四大望族经济实力、科举仕宦、文化素养、人脉资源、编刊特征、编刊家个案、著名选本与刊本的传播等方面，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的特点、规律和文化意义。作者一方面尽量展示晚明湖州四大家族编刊活动的共同点，另一方面更是在为我们寻找晚明时期湖州出版业共性当中的特性，然后进行比较、重组和呈现，这对当前传承中华文化、推动书香社会建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笔者出生在晚明望族茅坤家乡湖州练市镇的花林村，但对茅坤及茅坤家族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后来在读书的时候，从杭大中文系朱宏达教授那里得知，我的老家花林原来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十分有名的唐宋派代表之一茅坤的故乡，从此便开始了对茅坤及其家族的关注。我大学毕业论文就写了《集文章武略农桑于一身茅坤》，后来又任浙江大学张梦新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茅坤传》的写作，所以现在捧读赵红娟教授的大作，有一种非常熟悉的亲切感和一种如获至宝的兴奋感。

纵观文化历史长河，中国出版业在晚明时期，无论是出版内容，还是印刷技术，都达到了顶峰，而晚明出版业最

繁荣的地区就是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当时江南一带，涌现了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湖州等著名出版中心，每个出版中心仿佛是一座出版大厦，而入驻这些出版大厦的有许多世家望族。就世家望族参与著述、编刊活动情况来看，同处湖州一地的闵、凌、茅、臧四大望族堪称典范。在晚明出版这个大舞台中，有名有姓有记载的四大望族参与者就有79人之多，所编刊书籍达300余种，现存馆藏书籍约3000部。其编刊活动既注重精品意识和视觉效果，更强调经济效益，商业特征已经十分明显。

赵红娟教授通过对湖州四大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活动的展现，使读者可以了解明代中国出版业从家刻到坊刻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晚明社会经济文化的生动缩影，也可以感受到晚明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爆发出来的文化创造力。这些望族编刊家中，最著名的是以《春秋左传》首开湖州套色印刷先河，并编撰刊刻有30余种书籍的闵齐伋；编撰《两拍》且一生刊刻有25种书籍的凌濛初；编刊《元曲选》等10余种著作的臧懋循；因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文抄》而“海内无不知”的茅坤；编刊《东坡先生全集》等14种著作的茅维；编刊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的茅元仪等。

在对该书的研读过程中，我发现赵著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就是关注到了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不同之处。

茅坤、茅维、茅元仪为代表的茅氏家族的著述、编刊活动是在京杭大运河的两岸，是中国桑蚕文化的发源地、湖羊饲养的原产地。闵齐伋、凌濛初的著述、编刊活动是在太湖南岸的织里，现在隶属于吴兴区，为中国童装之都。臧懋循的著述、编刊活动是在天目山余脉顾渚山，现在隶属于长兴县，是茶圣陆羽撰写《茶经》的地方，是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这是地域文化的不同，造成了编刊活动的不同。

闵、凌二氏的财富累积过程，得力于纺织业。由于厝舍所产绵绸门幅宽，又有长度，所以畅销湖州各地。闵、凌二氏从这种纺织活动中获利，编刊活动的经济基础十分雄厚。臧氏世居湖州长兴水口，其顾渚山是唐代中期著名贡茶——紫笋茶的产地，晚明长兴顾渚山贡茶之役仍有，尤以该山明月峡所出界茶名声最响。但由于商业经营较缺乏而

又生齿浩衍，相比其他三大望族，经济实力较弱，因此刊行大部头著作时，会以前后集等形式分次刊刻。茅坤生活在大运河畔的练市，茅氏家族发挥大运河灌溉区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通过蚕桑业积累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又被投入店铺业、丝织业、刻书业，甚至高利贷等商业活动中，以获取更大收益。四大望族中属茅氏最富，故有百回巨著《折禹传》从创作到出版一夕而就的传说。这是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了刊刻规模的不同。

闵梦得与凌义渠因官居高位而又雅好书籍，从而推动家族刻书事业。凌迪知、茅坤、臧懋循因壮年罢官归田而从事编刊活动，并成为家族编刊事业的主心骨与主力军。凌迪在常州同知任上被罢官归家时，年仅38岁，从此优游林下，著述编刊。臧懋循36岁从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谪归，从此不再出仕，而以编刊活动谋生。茅坤44岁在大家兵备副使任上落职家居，基本上在家从事编辑、编刊活动，评选了《唐宋八大家文抄》《汉书抄》《史记抄》等众多书籍。凌濛初与闵齐伋则是因科举失意而投身于编刊活动事业的典型。凌濛初曾四中或五中副车，蹭蹬科场，内心愤懑不平，编撰《拍案惊奇》，聊抒胸中块磊。闵齐伋曾入太学读书，然进取无成，遂耽于著述刻书，成为湖州套版刻书第一人。这是官场仕途的不同，造成了刊刻目的的不同。

闵齐伋刻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兼具，所刊书籍多为市场畅销书的翻刻本，自己首刊的很少。凌濛初刻书以集部文学类为主，这与其文学家身份一致。其刻书多有凡例，而少有刊刻时间，这与闵齐伋刻书绝少凡例而多具刊刻时间正好相反。凌濛初刻书虽多朱墨本，但无两色以上刊本，而闵齐伋所刊之书三色套印本多达9种，其《西厢记》五色插图更是享誉中外。臧懋循是藏书家和戏剧理论家，重视戏剧作品收藏，其《元曲选》《荆钗记》等的编刊活动与此相关。茅氏刻书内容最广，而且质量高，影响大。就印刷颜色来说，则以墨本为主，但因受闵、凌套印影响，在天目崇祯间，茅坤家族也产生了一个刊刻套色书籍的团队，刊有套印本8部21种。这是刊刻方法的不同，造成了刊刻特点的不同。

凌濛初的编刊影响主要是编撰《两拍》而成为了畅销书。凌濛初在编写好《两拍》之后，并没有亲自刊刻，而是将

书稿交给了苏州尚友堂来出版，由于确有“拍案惊奇”效果，故崇祯元年（1628年）一问世，就翼飞胫走，成了海内畅销书。闵齐伋的编刊影响是套色印刷，他在前人套色印刷图画的基础上，首创了套色印刷文字，他以朱墨两色刊刻由孙月峰评点的《春秋左传》，从而成为套印文字书籍的第一人。茅坤的编刊贡献主要是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文抄》。作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就是在主张他的文学观念。该书在当时就盛行海内，明清两代一共刊刻了15次，引发了唐宋散文的评点与选编热潮。臧懋循的编刊贡献主要是编刻了《元曲选》，他让《元曲选》几乎成为元曲的唯一选本兼全本而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是刊刻影响的不同，造成了文化传播的不同。

赵红娟教授对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研究的最大突破，是没有把研究局限于文学编刊这个小范畴内进行，而是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四大望族的整个编刊活动，这也就能够更好地揭示四大望族编刊的特点与规律。明清江南家族图书编刊活动研究，是涉及家族文化、文学传播、书籍出版，是跨越文学、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社会学、出版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研究，很考验作者功力，是对作者“文化视野、文献功力、文学重心”的综合考验。

曾经在湖州师范学院教书多年的赵红娟教授，虽然离开了湖州到杭州工作，但她的研究方向还多为湖州的人文历史。她除了研究晚明江南望族的文学编刊与传播之外，还进行了“《臧懋循集》点校”“姚艮元日记整理”“拍案惊奇——凌濛初传”“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失落的苍穹——董说及明清之际遗民文化心态研究”等与湖州相关的文化课题，并已出版《凌濛初论》《拍案惊奇——凌濛初传》《明遗民董说研究》《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等多部反映湖州历史文化的著作。

